

红色基因

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形成
与传承的经典事例

原良志 陈瑞 王萍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红色基因

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形成
与传承的经典事例

原良志 陈瑞 王萍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形成与传承的经典事例/原良志,陈瑞,王萍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1

ISBN 978-7-5073-4216-1

I. ①红… II. ①原… ②陈… ③王…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研究 IV. ①D261.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1998 号

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形成与传承的经典事例

编 者:原良志 陈 瑞 王 萍

责任编辑:刘庆旻 宋柏晴

特邀校对:廉晓玉 晓 东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 销:新华书店

销售热线:(010)63097018

印 刷: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680×960mm 16 开 15.25 印张 210 千字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73-4216-1 定价:2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无论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的发展岁月，我们党始终重视作风建设，形成了一系列显著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优良作风。

这些优良作风主要有：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以及调查研究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的作风，学习之风，民主作风等。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纵观党的历史进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以优良的作风影响、带领人民群众投身火热的斗争实践。

毛泽东十分注重党的作风建设，反对本本主义，注重调查研究，开展党内批评，关心群众生活，并在党的七大上总结概括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

邓小平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一定要把“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江泽民把坚持党的优良作风与倡导新的时代作风紧密结合

起来，明确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继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并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

胡锦涛提出，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并倡导在全党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求真务实之风、艰苦奋斗之风、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励精图治，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强调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中央政治局带头作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并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密切党同人民血肉联系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党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事实证明，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党的作风好，党和人民就能够团结一致，攻坚克难；党的作风不好，党群关系就会受损，各项事业的发展也会受挫。

在今后的奋斗征程中，我们要大力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就必须首先学习、理解、掌握党的优良作风的内涵、本质和要求。党的光辉历史正是这样一个精神富矿，凝结着党的优良作风产生、形成和发展的鲜活资料，蕴含着激励后人的巨大力量。

基于此，我们从党的90多年的奋斗历史中，选取了50多个经典故事，以真实的背景、生动的细节、朴实的语言，诠释党的优良作风的形成和一代代的接力传承。

希望使我们，从党的历史中汲取营养，从优良作风中吸纳力量，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更加自觉、更加自信、更加坚强。

目 录

序	(1)
一、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	(1)
1. 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2)
2. 广为人知的著名校训	(6)
3. 这十五个字，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8)
4. 大学小讲师提出了时代大命题	(11)
5. “马列主义竟出在你们这个小茅屋里了”	(14)
6. 在高州开始破题	(18)
7. 科学发展使黄土高坡披上了更多绿装	(22)
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26)
1. 毛泽东为儿子请了一位陕北农民当老师	(27)
2. “把你这里作个依靠群众解决住房 问题的试点”	(31)
3. 这里没有什么首长，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	(34)
4. 英文版《邓小平副主席文集》告诉世人， 他是怎样的人	(37)
5. 多少个除夕、新年，他都是和基层群众在一起	(41)
6. 对我帮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 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们”	(44)
7. 人民群众在他们的心中至高无上	(47)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56)
1. 延川县长被雷击身亡之后	(57)

2. 三个月的错误，三十多年的自我批评 (59)
3. “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
间接的我也有份” (63)
4. “那个时候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 (66)
5. 历史在遵义城柏公馆的批评声中转弯 (69)
6. 对四位政治局委员作指名道姓的批评 (73)
7. 不听你们讲莺歌燕舞，
要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77)

四、艰苦奋斗的作风 (81)

1. 野兽出没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82)
2. 重庆八万元的奢华接待不及延安的家常便饭 (86)
3. 一块手表修了好多次，一双拖鞋穿了二十多年 (89)
4. 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就不盖政府大楼 (94)
5. 他们都是一样的人 (98)
6. 他的形象一直在习近平的心中 (109)
7. 为了实现“帮家乡办点实事”的承诺 (115)

五、“两个务必”的作风 (119)

1. 我们绝不当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 (119)
2. 解放军成军以来唯一一次彻底的败仗 (122)
3. 他们倒在了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下 (126)
4. 这句格言来自党的“八大”开幕词 (129)
5. 同一个题词内容，两次挥毫书写 (131)
6. 在西柏坡重温那段使人警醒的话语 (134)
7.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138)

六、调查研究的作风 (142)

1. 毛泽东三到才溪乡 (142)
2. 伯延村的四个昼夜 (147)
3. 回到家乡问计农民 (151)
4. 改变中国的南方巡视 (155)

5. 建国后最先到海南调研的中央领导人	(161)
6. 市长上任第一天,大清早现身菜市场	(164)
7. 围绕六个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丰硕成果	(168)
七、学习之风	(173)
1. 去世前半个月,还要阅读《容斋随笔》	(174)
2.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177)
3. 中组部的“窑洞大学”	(180)
4. 谪居江西的日子,书陪伴着他共度岁月	(183)
5. 他能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	(186)
6. 不同的出身学历,共同的兴趣爱好	(188)
7. 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已经制度化、长期化	(194)
八、民主作风	(196)
1. 晋西北士绅参观延安民主实验	(196)
2. 延安“窑洞对”,破解历史周期率	(200)
3. 中央来电征询对待富农政策的各种意见	(204)
4. 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	(209)
5. 这是他们不变的追求	(211)
6. 四千高级干部对党史重大问题的民主评议	(223)
7.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 这样产生的	(227)
参考文献	(231)
后 记	(235)

一、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确立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这标志着我们党三大优良作风的正式形成。

理论联系实际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的概括表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基本精神是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马克思、列宁反复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遵循这一原则，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了深刻的论述和发挥。他指出，是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进行认真研究，正确地解决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从中引出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它同理论与实际相分离的主观主义态度是根本对立的。

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体现了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相联结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无产阶级的政党作风上的具体表现。正如习近平强

调的，“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1. 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1930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攻克江西寻乌县城，在此驻扎一个月。时任红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针对红军中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决心下大力气纠正此种现象，以充分发动群众，加强根据地建设，为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

毛泽东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了摸清根据地实际情况的调查活动。他调查的地点就选在寻乌县。调查的成果是一篇4000多字的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1964年6月，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30年代调查研究工作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概括，是同党内教条主义错误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历史总结，也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原则运用于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

这篇文章曾在红四军中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印成小册子，后因敌人多次“围剿”而失传了。直到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荣山公社官山大队一位叫做赖茂基的农民，把自己珍藏了27年之久的一本油印的《调查工作》小册子，作为革命文物贡献出来，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才失而复得。虽然由于年代久远，这本小册子的纸张已经变得发黄了，但是，它的重新出现，使毛泽东非常高兴，他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遥想当年，当时党内某些存在着“左”倾思想的人主张在农村执行“左”倾政策，提出“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把土豪劣绅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子女混为一谈，不区别对待，一律斗争、打倒。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有的地方乱烧乱杀，执行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使他们的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这样，就使得地主、富农看不到出路，拼命来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看到这种情况，毛泽东为

了正确制定在农村对待富农的政策和在城镇中对待小商业者的政策，在寻乌进行了实地调查。

毛泽东从当时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出发，设定了九个方面内容，农村人口成分、旧有田地分配、公共地主、个人地主、富农、贫农、山林制度、剥削状况、寻乌文化，作了详细调查。

一连十几天，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召开了有当地中下层干部、中小工商业者和其他阶层的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他仔细地向大家询问粮食、食盐、布匹、药材、生猪、杂货、土特产、运输等方面的详情，着重了解工商业的情况，如：经营了哪些行业、做生意的手段、商品的来源与销路、茶叶等的年产量与价格，甚至理一次发多少钱、做一件衣服多少钱都细细了解，认真地做笔记。

座谈会后，他又召开了一次有 50 多人参加的总结调查会。会上，他坦诚地说：“我来寻乌调查了近 20 天，承蒙诸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获得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今天请大家来核对材料，叫作集思广益。”随后，他把自己还没弄明白的或是没有把握的问题一一提出来，虚心地向大家请教，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令他十分高兴。

毛泽东在调查中了解到：收租 200 石以上的中等地主和收租 500 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因为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由此可见，地主占有土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出租土地获取地租，至于出租出去的土地是否得到改良、耕种土地的生产工具是否改进，地主并不关心。作为一个阶级而言，地主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无促进作用，在土地革命中将其打倒是完全应该的。

寻乌的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 32%。依据他们的经济地位，其政治态度又有三种区别：一是

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的 0.96%，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的 22.4%，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的 8.64%，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当时寻乌的实际斗争。

普通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一个占地主全数 48% 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他们把钱看得很重，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所有放高利贷的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调查。就整个阶级而言，地主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阶级，是土地革命必须打倒的对象。但对这个阶级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其中的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不能一概而论，有相当一部分小地主其实也是愿意革命的，有的甚至有较高的革命热情。在红四军到来之前，在寻乌领导当地革命斗争的人中，有的就是出身于这类小地主家庭，陪同毛泽东调查的古柏就是这种出身。可见，不能将地主阶级的每一个成员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作为革命的对象。对于这种情况，如果不做深入的社会调查是难以了解到的。

毛泽东在调查中了解到，关于土地革命，寻乌革命委员会开始提出了四个办法，要求区乡苏维埃召开群众代表大会，讨论选择其中的一种。一是照人口分配，二是照劳动力状况分配，三是照生活来源多寡分配，四是照土地肥瘦分配。结果多数地方采取第一种办法，按照人口数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劳动能力有无、大小，以人口除田地的总数平分，并且得到多数群众的拥护。

对于分配土地的区域单位，毛泽东调查发现，农民反对以大的区域（区）为单位分田，就是以乡为单位也不赞成，而是愿意以村

为单位。主要是因为村里的田近、熟悉、方便。毛泽东说：“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那种以为农民不愿搬迁，是思想陈旧和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至于具体如何分田，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最核心的是一个“平”字。他说：“平田主义是最直截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逼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

寻乌调查对中国共产党形成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土地革命既是农村土地的重新分配，也是农村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革命本身意味着各阶级、阶层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正确地划分农村的阶级阶层。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而在土地革命中出现“左”的偏差，往往首先是在阶级成分的划分上，将一些人的成分作了拔高，结果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依靠和团结对象。后来，毛泽东曾这样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寻乌调查给毛泽东以很深的感触，《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这次调查研究的思想成果。毛泽东阐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他由此得到了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话，在今天仍是真理。

2. 广为人知的著名校训

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前的广场上，有一块石刻，上书“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制定并亲笔题写的校训。

1943年初，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从那时起，到1947年3月中央党校因内战被迫暂时停办，毛泽东一直直接领导中央党校的工作。

毛泽东出任中央党校校长后，采取了三项重大举措：一是改革办学思想，停止执行理论与实际割裂、脱节的教学计划和安排，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二是鼓励学员参加大生产运动，一方面锻炼自己，另一方面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自给自足；三是广泛开展文艺活动，活跃生活，配合教学。

此时，正值延安大生产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党校学员种粮、养猪、烧制木炭，还建了豆腐坊、粉坊、糖厂、酒厂等各类作坊和工厂，组织了自己的运输队，可以跑运输。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动手，创造奇迹。党校召开大会、组织活动，缺少一个大礼堂。党校学员就设计图纸、运送材料、盖房等，自己动手完成，其间只请了少量的石料工人。

1943年11月7日，大礼堂竣工，规模很大，能容纳千余人。学员们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左看右看，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有人提议在礼堂正面的墙上，挂个校训题词，那就十分完满了。大家都很赞成。

说到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了中央宣传部的范文澜先生。范文澜是著名历史学家，学养深厚。但范文澜试着写了几个题词，自己都不满意，便提议去找毛泽东写。

毛泽东欣然答应，立即叫人拿来四张二尺见方的麻纸。他沉思片刻，饱蘸浓墨，迅速挥毫，“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随即跃然纸上。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乃至全党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

据有关学者考证，“实事求是”是一句古语，最早见于东汉史学

家、文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王刘德是西汉时期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汉武帝刘彻之弟，班固书中称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成语“实事求是”便由此而来。

1914年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以“实事求是”为校训，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学校迁入岳麓书院时，校长宾步程撰写“实事求是”挂匾书院正楣。毛泽东在长沙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寄居岳麓书院，对“实事求是”的匾额是熟悉的。

但无论“实事求是”一词的首创者，还是校训、挂匾的使用者，他们都没有深入研究过“实事求是”内涵为何物。

毛泽东古词新用，将“实事求是”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赋予了“实事求是”全新的科学含义。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党的事业的不断发展，“实事求是”这一校训，也成为广为人知的著名校训。

“实事”，毛泽东解释为，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的实际情况，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

毛泽东解读和强调“实事求是”的用意，不是要求每个人把所有的客观事物都搞清楚，都能找出一切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发现所有规律。其要义在于，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创新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还解释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这样，经过毛泽东全新解释的“实事求是”进入哲学最高领域，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正如后来邓小平所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科学解释与宣传，“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弘扬的优良作风。

3. 这十五个字，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陈云早在延安时就坚持按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他生前多次强调过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其实质与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

“不唯上”，不是说上级的指示不听从，不执行，而是说接到上级指示后要认真研究，考虑怎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不要机械照搬。

“不唯书”，不是说不读书，而是说读书时要认真领会精神实质，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

“只唯实”，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是可信的。

陈云的这种提炼，不仅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而且给我们提出了做到实事求是的具体原则。

如何了解事实？陈云的做法就是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去了解事实。他有一句名言，就是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制定政策。

1949年5月，他从东北调回中央负责中财委工作后，7月份就开始了解全国的财政经济基本情况，带领财政部门的一部分负责干部去上海调查。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提出了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和摆脱困境的基本设想及需要采取的主要措施。平时在北京的时候，

尽管工作繁忙，时间紧张，但他还是每月挤出一些时间去王府井、前门、东单、天桥等市场作调查，了解日用百货、蔬菜、肉食等供应情况和物价变化势态。有一天，他下班没回家，让司机拉他到大栅栏去看市场、察行情去了，家里人不知他的去向，四处打电话询问，结果虚惊了一场。

1951年到1961年，陈云为了发展农业，解决缺粮问题，四次亲自下农村做调查研究。第一次是1955年1月中旬，去了解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情况。这次他直赴青浦县小蒸乡，住在老战友陆铨家中。专门看了米店、粮仓，找农民、商人、教师、居民、干部座谈，征求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意见。有称赞的，也有反对的，有的只称赞统销不称赞统购，各种意见都有，陈云让大家随便讲，有什么就说什么。然后，他向大家耐心地解释了国家为什么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取得了大家的赞同。但通过调查，陈云了解到征“过头粮”的问题，回到北京后立即向中央提出粮食统购统销中的“三定”政策，即定产、定购、定销，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赞成和拥护。第二次是1955年5月至7月，调查范围从北边的黑龙江到南边的广东，从西边的陕西到东边的上海，重点在江苏、浙江两省，集中点首先还是青浦小蒸乡。在这里，他与农民探讨亩产如何能翻一番，有无可能？需要多长时间？需要什么条件？经过调查，认为十年内粮食亩产翻一番在苏南地区是可以的。别的地区怎么样，他又先后去了山西、安徽、湖南、吉林等地，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提出南方和北方增产的办法和条件。指出农业要发展，除靠政策、科技、投资外，还要靠水利、化肥和机械。第三次是1957年3月，还是到了青浦县，主要调查血吸虫病的危害及治疗情况，以保护农业劳动力。第四次是1961年6至7月，又去青浦县小蒸乡。主要调查“大跃进”后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并邀请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院长顾复生等3人同往。他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历时半个月，两个半天听报告，开了10次专题座谈会。陈云四到青浦调查，共研究了10个问题，写了3个专题报告。经过他的调查，了解到了事实的真相，对中央制定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要想知道“实事”就必须走调查研究之路，作认真反复